

庭院式豪华墓葬的主人是谁?

本报驻陕西记者 赵建兰

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该省西安市高陵县的泾河工业园区内竟然埋藏着一座地下“庭院”般的家族墓。该墓葬群不仅有三层结构的墓室,漆棺上还发现了巨幅描金漆画。如此大面积且保存完整的随葬漆画,不仅在陕西是首次发现,在国内亦属罕见。

如此豪华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拥有怎样的高官厚禄方能享受如此厚葬礼遇?记者带着种种疑问开始寻访。

墓主为秦藩王府知印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介绍,主人的墓现在还没有打开,发掘过程中也没有发现盗洞。墓室前边的填土里边有很多明代瓷片,精细一点的属于青花瓷,估计墓室里还有更惊人的发现。

在对古墓的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块共计292字的墓志。根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可基本确认是明朝万历年间秦藩王府知印张栋,别号三槐。张栋,世代居住在陕西省高陵县,生于嘉靖1535年,卒于万历1585年,有夫人马氏、亢氏、李氏,共有三个儿子张应祯、张应祥、张应龙(一出生便过继给二伯张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小明解释称:“知印即秦藩王府管印章的大管家,七品以下官吏。知印官衔相当于如今省一级办公厅的负责人。”

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为了巩固政权,朱元璋将太子之外的24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分封在各地为王。其中二儿子朱棣(sh à ng)被封为秦王,位列诸王之首,藩王府设于西安府城东北部。秦王世代承袭,在王府城中居住了260余年。秦王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藩”,其后代陵墓被称为小“明十三陵”。

陕西的古墓多为周秦汉唐,明代墓非常少,精美又保存较好的更加罕见。“这可以说是陕西发现最好的明代家族墓。”王小明告诉记者:“张氏家族墓群分为东、西二区,墓四周围有夯土空墙,大体呈长方形。东区3座墓葬为张栋及其两个儿子的墓葬。迄今已发掘19座古墓,可确认属于张氏家族的墓葬11座,能够与墓志对应的8座古墓分别为张栋兄弟4人和其叔父以及3位子嗣的墓葬。”

张氏家族缘何会埋葬于此,从墓志铭的署名来看,是其二儿子应祥所写。考古人员由此推测,张栋1585年去世时很有可能空地还没选好,暂时埋在别地,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应祥才将其墓家迁来此处,并立券于墓地。

2米长棺盖上的描金彩绘

在这处明代家族墓葬群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3座彩绘漆棺。这3座彩绘漆棺保存完好,分别由石室、木椁、彩棺组成,令人惊奇的是棺椁之间采用单卯结构,不用钉子而严丝合缝,工艺高超。在张麟趾(张栋的长子,麟趾可能为其别号)墓的漆黑棺盖上发现了巨幅描金漆画。长达2米多的棺盖上绘满出水荷花,充分表达出“鱼戏彩莲间,莲叶何田田”的美丽意境,色彩鲜明、做工讲究、栩栩如生。棺木的另一侧则绘着牡丹花的图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望生说:“这朵描金的盛开荷花十分饱满,笔法罕见。作为漆木棺上保存下来的珍贵漆画之一,荷花与牡丹等花卉一起,共同构筑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理念,希望人的一生富贵吉祥。”

据介绍,目前已清理出的9座墓室,8具棺木中有3具彩棺,干燥的墓室及未遭盗掘是漆画保存下来的重要条件。为避免这些漆面受温度和湿度的影响而卷曲开裂,考古工作者将清理出的部分包上了塑料薄膜,以保持出土时的湿度。

同时,考古人员还发现了20多件保存完好的器物,大多是冥器。其中出土了包括有锡灯、锡盒、锡酒壶的锡器16件,还有明代最流行的青花瓷11件,有瓷罐、瓷盒等,以及戒指一枚、铜钱10枚以及买地券1方。

在保存如此完好的明代官员墓中,到底会有哪些精美的瓷器呈现?棺椁内还有哪些宝贝?随着古墓的进一步发掘,其神秘面纱有望进一步揭开。

该墓成奢靡生活的见证

与以往不少古墓只有一个墓室的情形不同,张氏家族墓建得十分讲究。3座古墓呈“品”字形分布,均由墓道、前厅、墓门楼和墓室组成,周围有完整的近似长方形的墓园,墓门上部有仿木构的砖雕或石雕门楼。站在地面往下看,深约10米的墓葬坑整体犹如一个个小庭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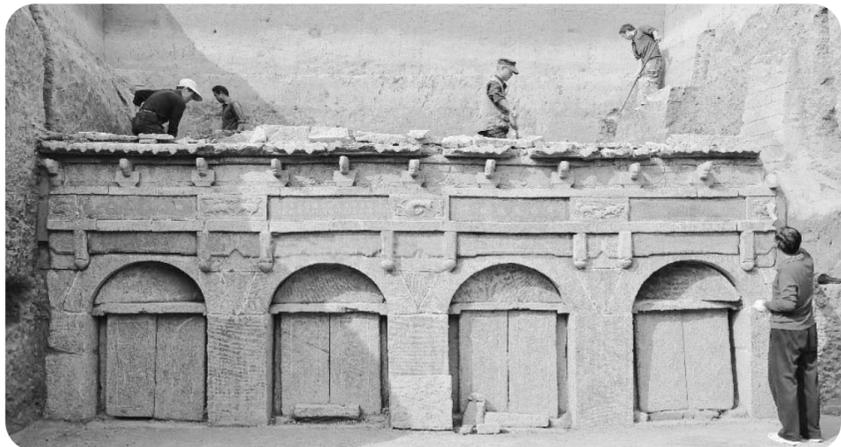
王小蒙介绍说:“在陕西,明代中晚期墓葬一般多为土洞或砖券,包括明秦藩郡王、县主墓葬也为砖券,而张氏家族墓虽然规模不大,却是陕西地区少见的明代石室墓,并全带有仿木构雕刻的门楼,这是迄今为止首次

公布的带有仿木构石雕门楼的石券墓(据说1990年在院张村周围还发现过石券墓,估计也是张氏成员的墓葬,但资料一直未公布)。此外,在已发掘的张栋兄长张检的夫妻合葬墓中,出土了重达一两的纯金镂空凤凰牡丹葫芦耳环和镶宝石金簪,及其他(金)银簪等遗物,这是家族墓区迄今出土的最为贵重的随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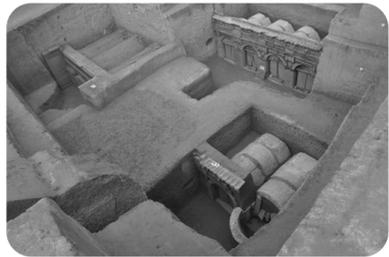
从文献记载来看,张氏家族成员中并无高官,张栋也不过为七品以下官吏,其兄张检则生前不仕,只因饥年赈灾,被朝廷旌表,授“义官”。(义官并无实职,只是荣誉称号。)之所以会将墓室建造得如此奢华,考究,“与其世业农贾、家境富裕有很大的关系。”王小蒙说:“这也首次从考古学上为人们了解明代官员的奢华与气派生活提供了珍贵资料。”

据悉,东区墓葬发掘结束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今年将进一步对西区进行发掘。西区墓地可分为南、北两部分,目前,南部清理了4座,多为土洞墓,有少量黑釉粗瓷的碗、小罐等随葬品,尚有3座砖室墓未打开。北部分布有5座墓葬,为张氏四兄弟中的三人和他们的一位叔父以及一位子嗣。现其中的2座墓已经清理完毕,其余3座还在清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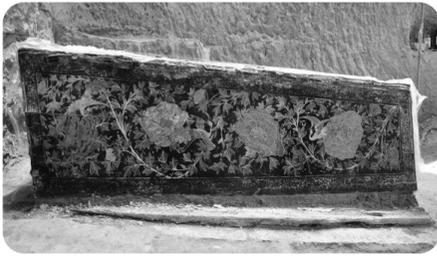
未来,该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所发掘的漆棺彩绘,使其不至于褪色朽坏,则是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的重大难题。



墓主人和三位夫人合葬墓



张氏家族墓地俯瞰



张麟趾墓彩棺两侧绘满了出水荷花

消息长廊

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复活”

本报讯 从新疆吐鲁番市旅游文物管理局获悉,经过前期修复,新疆吐鲁番现存坎儿井出水量增加20%。目前,三期工程仍在继续。

有“地下运河”之称的坎儿井,不仅是一项古老的水利设施,更是一项物质文化遗产,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年久失修,淤塞情况严重,很多渠道存在塌方隐患。此外,坎儿井水源地和灌溉区过度开发机电井,使得地下水水位猛降,很多坎儿井因此渐渐干涸。

为了让古老的水利设施恢复生机,2009年以来,国家先后投入3000万元,实施坎儿井保护与利用工程。目前,在维持坎儿井原始风貌基础上,已对54条坎儿井实行掏捞清淤、卵形涵加固、安装井盖等保护工作。维修加固后的坎儿井

出水量较前普遍增加20%,灌溉面积提高了80%以上。吐鲁番市坎儿井办公室副主任姚成介绍,目前,正在进行的坎儿井保护与利用三期工程共投入650万元,计划2013年3月底前对吐鲁番市18条坎儿井加固维修。

对坎儿井的掏捞和加固工作都是当地农民完成的。据悉,自古以来,每到冬闲季节,当地农民自发对坎儿井掏捞清淤,以保证来年的出水量。掏捞工作需要下井30至50米,完全依靠手工将沉积于井底的淤泥一点点运送到地面上,劳动强度非常大。现在,政府不仅为掏捞农民发放了拖拉机、井架等各种工具,还为工作人员购买了人身保险。此外,还为参与掏捞加固工作的每个农民发放至少5000元的收入。(江文耀)

甘肃古生物化石有了“新家”

本报讯 在甘肃和政县,扒开不深的泥土,就能找到大量的古生物化石,甚至很多村民家里就堆放着这些珍贵的化石。不过,随着近日国土资源部将当地正在建设中的化石保护项目正式命名为“甘肃和政古生物化石国家地质公园”,这些远古的生命遗骸将不再沉寂地下或被乱采滥挖。

甘肃和政县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汇地带,总面积960平方公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全县迄今已经发现化石出露点50多处,分布面积达700多平方公里。(黄文新)

由于随处可见且采集较为方便,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村民在耕作时会发现的化石带回家,有些人甚至以挖掘化石谋生。近年来,当地加强了对乱采滥挖化石的清理整顿,并筹集资金征集流散于民间的3万多件古动物化石,建立了详细的调查数据。

据介绍,规划建设263.8平方公里的古生物化石国家地质公园,将涵盖两条化石带和两个化石园及多个景区,预计建设完成时间为2020年。总的目标是建成国际级古动物化石保护与研究基地、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黄文新)

话匣交流

考古史上那些无法挽回的故事

高蒙河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许都是正确的,最起码是我们认为正确才去做的。正如现在我们看100年前人们所做事情一样,100年后我们的子孙也会看到我们做的事情——大部分竟是那样滑稽可笑,匪夷所思。因此,未来的考古学家极有可能得出当今考古学家的大量发现和研究成果,简直是挥霍人类宝贵遗产的结论。

他们一边思考,一边把我们的教训列举出来,写给他们自己看,也留给他们的子孙看。

失误之一: 挖错了地方

在我国,一些小地名的重名率很高,一个村不重,一个乡可能就重,一个县里有几个同名异地的地方都不稀奇。

三峡工程重庆库区万州地区的陈家坝就是这样重名的地方。一个陈家坝在长江南岸,属五桥区,一个陈家坝在长江北岸,属龙宝区。1998年上半年,从西北大老远来的一支考古队,人生地不熟地到达万州,即与当地文化局取得联系,希望帮助落实发掘地点。局里的领导告之陈家坝就在万州市区的长江对岸,属五桥区。于是考古队便到这个陈家坝安营扎寨。可是经过个把月的钻探勘察后,怎么也没有找到文物抢救规划上的任何墓葬线索。考古队这才发现,规划资料上的陈家坝根本不是他们钻探的这个地点,而是万州以西几十公里处龙

宝区武陵镇的那个陈家坝。

失误之二: 缺乏考古经验

20世纪70年代发掘马王堆汉墓时,据说曾在棺椁储藏物品的一个果盘中发现有完整的藕片,取出来时一碰就碎,鲜艳的藕片也随之而去。藕片的消失,告诉人们长沙2000年来从未发生过地震。这对国家安排经济建设项目布局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但对植物学研究来说,却失去了一项难以再现的重要物证和研究资料。

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了一个杯形铜壶,壶盖密封得非常严实。一个初次参加发掘的学员把它捧在手上,抹去器表的泥浆以后,找不到开盖的地方。倒来倒去,一不留心,把壶冲开了,倒出一坛清水。马上有人说:“是酒,不要倒掉!留着化验!”但说时迟,那时快,已经晚了,水被倒了个精光。也是这座罗泊湾汉墓,考古队员打开一个盖着盖子的陶盒,看见盒内装满青青的梅果,叶子翠绿色,像刚摘下来的一样,赶忙递上来,想叫人拍一张彩色照片。但却眼看着树叶和果子变色,不到一分钟就变成了黑色。这种酸梅在当地每年4月成熟,出土时的绿色青熟,说明下葬的时间是夏初之际。

1993年,江苏连云港著名的尹湾汉墓文物清理结束后,考古人员召开了现场办公会,向当地县政府、文化局和镇党委书记汇报了这次发掘的成果。镇里的

一位领导伸手就从桶里取出一片木牍观看。就是他这个不经意的动作,给以后的释读木牍留下了永远解不开的疑难。因为他取看的那片木牍正是24方木牍中最为重要的吏员簿,而他的大拇指正按在木牍的右上部,只是轻轻地一带,就把这片木牍最重要、最关键

的记有这片集簿名称的字给抹掉了。今天给这片集簿命名时,有的说是吏员总簿,有的说是定簿,众说不一,疑义相析。后来把它带到上海,用远红外模糊图像处理时,还是没能恢复它的庐山真面目。

“现场办公会决定,由连云港市博物馆负责抢救和保护这批简牍。然而,当我们要携带这批简牍回馆时,由于支付尹湾村开工补偿费没有到位,尹湾村的民工不让我们带走,只好暂时将简牍留在办公室。待我们一星期后回到尹湾村时,看到塑料桶中浸泡的简牍,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原来泛着金黄、闪出油光的简牍已经完全变黑,而原来清晰可读的墨书,现在已经十分模糊。一堆发黑霉变的简牍已经失去了它生命的活力。”发掘者的这些回忆,使我们真实地感受到“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至理名言。

失误之三: 没按专业要求操作

考古发掘的基本要求是要挖到生土才算工作完毕,可前面提到的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的清理,竟使考古工作者前后往返了三

次,简直是创造了考古发掘反复工作却未能完成的吉尼斯纪录。这个墓葬是一座具有南方区域特点的木椁墓。椁室早年被盗,但盗得不彻底,仍出土了1000多件随葬品。当年曾在工地上参加清理的蒋廷瑜先生后来回忆道:

大部分工作人员于8月20日撤离工地,回南宁去了,只留下5个人做收尾工作。但我很迷惑,因为椁室的壁板和底板都没有取出来,整个椁室范围没有完全暴露,发掘工作还没完成。他们与我感同,希望再作一次细心的考察。9月1日,我们找到贮木场的工人,带着电锯,请他们将冒气泡的地方

的底板锯断一块,撬开来看,只见下面露出一大片黑糊糊的泥潭。清除上面的淤泥,发现下面有一根南北纵向的原木,土坑的周围是人工有意埋藏的东西。

得到这个新发现的消息,已经回到南宁的考古队员们又赶回墓地,重新开始发掘。他们沿着这根木头摆放的方向往前追找,前后约2米就到了尽头。看到原木两头是截平了的,平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土坑内,土坑的周围才是红色的生土。原来,这是为椁室内墓主人陪葬的陪葬坑,原来是殓放陪葬者的“圆木棺”。后来,在椁室下一共清理出六女一男7个陪葬者,这些陪葬者都有棺木装殓,身穿彩绣衣服和鞋袜,身旁都有随葬品,人葬的姿势是仰身直肢,死态正常,骨架上没有损伤,不是像奴隶那样砍杀致死,而

像是被毒死的侍从或歌舞伎。

这次意外的发现使考古人员认识到,椁室内的器物清理完毕,并不是万事大吉地可以结束考古了。清理古墓不清理到生土,肯定会留下遗憾。但他们还是把这个遗憾留到了第三次返回墓地。

原来,在清理椁室时发现一壁场方,泥土压迫壁板向前倾斜,压住了两根椁室底板,无法取出,于是放弃了,没有再发掘,撤离了工地。谁知,当地的化肥厂工人在考古队离开后,相中了考古队不要的木板,这些木板都是杉木材质,埋在地下两千年还未腐朽,阴干以后,锯开还可以做家具。他们试图把每一块木板都取出来,最后把考古队没有取出的被场方土压住的两块椁室底板也吊起取出。谁知椁室底下居然又露出了两个专门埋藏器物的土坑,里面堆满了器物。

考古队第三次回到墓地,“看到经工人取出的那些器物,又惭愧又高兴。惭愧的是,因为我们操作的失误,差一点把最珍贵的器物打入地下冷宫。高兴的是,幸亏有人心地挖开了,探查了出来,挽回了这一损失,也使我们大开了眼界。”当年考古队员回忆道。

这些当年不知为何挖掘在墓葬一角及几乎被考古学家们遗漏的器物坑,出土的大部分是青铜器,有30多件,包括大型铜鼓、羊角钮钟、九枝灯、铜盘、可能盛酒的杯形壶、直径近70厘米可以沐浴用的大铜盆等。

罗泊湾汉墓的发掘无疑是那个时代广西考古能力极度薄弱的缩影,这在今天看来就是完全违反了最基本的考古操作规程,我们在20世纪全国百大考古发现中果然也没有看到它的名单。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

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世界最古老陶罐

入选二〇一二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邵军

美国《考古》杂志在2013年第1期评选出了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这十大考古发现分别是:玛雅太阳神面具(危地马拉)、尼安德特人的药箱(西班牙)、最早使用的毒药(南非)、阿芝特克人的葬礼(墨西哥)、凯撒的高卢前哨(德国)、欧洲最古老的石刻(法国)、最古老的陶罐(中国)、“科学怪人”木乃伊(苏格兰)、2000年前窖藏的珍宝(以色列)、最古老的葬船(埃及)。按洲别分,欧洲有4项,北美洲、非洲和亚洲各有2项入选。

中国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的万年前的陶器入选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这也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进行合作研究的一个成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张弛教授等于2012年6月28日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仙人洞遗址万年陶器》的文章,对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

陶器的发明在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不久以前,人们还认为,陶器的出现是大约1万年前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一部分,带动了农业、家畜驯养以及磨制石器的发展。然而,关于更早年代出现陶器的一项考古发现,将所有这些理论都推翻了。2012年,在中国江西省的仙人洞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考古学家在上世纪6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都在仙人洞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但对于最古老陶器的年代一直不明确。中国、美国和德国的研究人员重新调查了该处遗址,并对取样进行放射性碳断代法测定,将最早出现陶器的时间确定为2万年到1.9万年前。这项研究的参与者之一、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同时也是《科学》杂志关于该考古发现文章合著者之一欧弗·巴尔·约瑟夫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陶器。”“所做的这些,意味着时代更早的陶器可能会在中国南方发现。”

江西仙人洞遗址坐落于江西万年县大源乡境内,地处赣东北石灰岩丘陵地区的一个山间盆地。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考古人员就对遗址有过大规模的发掘,1993年、1995年和1999年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AFAR)组成联合考古队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出土了

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人工制品和动物骨骼等。其中早期陶器的出现引起了学术界高度关注。由于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陶器的发明与农业的出现、人类的定居生活等有关,而这些活动是伴随着全新世大暖期的到来而发生的,所以陶器最早出现的时间基本上应在距今1万年左右。由于早期陶器保存下来的陶片比较碎小而且珍贵,无法提取里面

残留的有机物进行直接的年代测定。尽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年代学实验室针对仙人洞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年代问题先后做了不少工作,测定了很多的数据,但因无法明确提供碳十四年代数据的样品与陶器的等时关系,也就无法对早期陶器的年代下一个准确的结论。

2003年至200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系统采集了碳十四测年样品,准确把握和记录出土陶片与测年样品的地层关系,结合地层沉积微结构分析方法,确定该遗址陶器出现的时间约为距今1.8万年。成果发表于2009年的PNAS杂志。基于这样的研究积累,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合作团队决定对江西仙人洞陶器的年代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江西万年县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2009年在重新清理出来的考古地层剖面上采集了系列碳十四测年样品和地层微结构样品,确定碳十四测年样品与陶片的地层等时关系,证实以前发掘的考古地层是人类活动形成的原生堆积,不存在自然过程或者后期活动的搅扰,所测定的碳十四年代代表了同层位陶器的年代。

由此证实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2万年,是目前世界上已发表陶器的最早年代。当时正处于末次冰期的冰盛期,早期陶器年代的准确测定颠覆了传统认为陶器是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后才出现的观点,为探讨现代人应对环境变化的策略以及研究陶器在人类社会演化中的作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早期陶器的测年结果表明中国南方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此后一直延续使用没有中断,并在冰期时传播到日本和远东等邻近地区。今后课题组计划继续对早期陶器的用途进行研究。